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开沅 余子侠\主编



追求卓越 坚守自由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

刘筱红 金珂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追求卓越 坚守自由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

章开沅 余子侠 主编
刘筱红 金 珂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1年·济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求卓越 坚守自由——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刘筱红,
金珂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章开沅,余子侠主编.第2辑)
ISBN 978-7-5328-6274-0

I. ①追... II. ①刘... ②金... III. ①胡适(1891~
1962)—生平事迹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6952号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开沅 余子侠 主编
追求卓越 坚守自由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
刘筱红 金珂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3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版 次: 2012年 月第 版
2012年 月第 次印刷
印 数:
规 格: 787mm×1092mm 16开本
印 张: 印张
插 页: 插页
字 数: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6274-0
定 价: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作者简介



本书著者：刘筱红，祖籍河北省临西县，1957 年生于湖北省红安县。1977 年参加高考，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史学到管理学，走了一条由古而今、由历史到现实的治学路径。主要著作有《名士风流：胡适的魅力》、《尝试者：胡适思想评传》、《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20 世纪老学史》、《管理思想史》等。曾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近年来主要研究领域在社会政策及基层妇女参与治理方面，发表论文多篇，其成果曾获得省级奖励，多份政策咨询报告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



追求卓越 坚守自由



本书著者:金珂,山东新泰人,1978年生。200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先执教于中学,曾任学校团总支书记,后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现任职于宁波市某行政部门。毕业论文以《胡适对道家的解读》为题,获得学院本科毕业论文一等奖。发表《胡适的道家观》等论文多篇,其中多篇工作论文获市级奖励,两篇调研报告被省市有关部门采用。



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些大学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层次、水平，但凡能赓续流传至今者，大多经过漫长的艰苦而又曲折的奋斗历程，并且留下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必将有所裨益。历史同样呼唤人们面向未来，它只为现实提供借鉴与智慧，决非单纯诱使人们沉溺于怀旧之情怀。

在百余年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大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无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



些先驱者的功绩。特别是其中那些办学有成的著名校长,他们和他们所辛苦经营的著名大学,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块丰碑。他们教育思想的丰富精粹,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践业绩的泽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肯定与尊重。可以说,无论是其成功或是错误(甚至失败)之处,都给后世留下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我们编辑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并给以阐释评论,不仅仅是为了继承这笔遗产,为了纪念逝者,更重要的是为今日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提供参考。

现今的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是从数量、规模、师资、设备、水平哪一方面来说,当然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那些大学。然而,这些老大学毕竟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为许多大学的发展做着贡献。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而某些重要的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远远大于其相关连的有形资产。所以,这些年来,不少精明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图书、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底蕴。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且迟至现在只能说是亡羊补牢。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既往办学者的经验教训,继承与发扬其优良传统,避免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端遗留的消极影响。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而人们也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于历史的超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复前人



已经走过的路,真正以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为起点去攀登新的高峰。我反反复复讲这些老生常谈,决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因循守旧。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由于不尊重历史而蒙受的损失与走过的弯路已经太多太多,而且这种错误往往是周而复始地出现。真理不怕重复,至少是对于那些不知历史为何物而盲目自信的所谓权威人士,更应该经常忠言直谏(请原谅我又用了一句陈腐话语)。我们这一代高等教育工作者,亲身经历此类弯路太多,因而才有如此深沉的感慨,也才有如此深切的醒悟。

教育史是人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着重研究人类如何改造与优化自己,包括相关理论、观念、方式、方法及其实践等方面。现时人们总是片面强调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殊不知教育还必须正确引导社会的走向。教育史不仅记载教育如何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也记载教育如何促进社会进化,特别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如何纠正时弊乃至推动社会变革。教育并非总是被动地亦步亦趋地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前后自相延续的相对独立性,而其中恰好蕴含着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如果背离教育的基本规律,任何貌似新奇的变革终将遭到失败,甚至遗留长远的负面影响。这类惨痛的教训,我们经历得还少吗?

20世纪80年代,我曾参与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然



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经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亲切怀旧话语。我给学生做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用对话交流方式,学生虽然听得兴趣盎然,自己却惟恐口无遮拦而可能给他们以某些误导,所以,每逢听见过去的学生复述我的若干“佳句”时,内心深处往往涌生惶悚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于历史上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理解渐深而敬佩日增。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却能与众多教职员工同心协力、苦心经营,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并且在国内外赢得与日俱增的声望。可以说,他们的生命与学校已经融为一体,而学校的声名正是他们与众多教职员工一起用心血浇铸而成。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等。我想,《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出版,当可使读者重温这些著名教育家的音容笑貌,并从他们的生平业绩中吸取许多有益的养分。

他们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大学办成海内外公认的名校,首先在于他们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并且把人格塑造放在首要地位。在他们看来,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只是手段,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才是主要目标。因此,在要求学生努力读书的同时,更强调学会做人,而人格教育遂与通识教育合为一体。同时,他们都具有世界眼光,不仅注意教



育与国际接轨,加强对外学术交流,而且关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瞄准发达国家顶尖名校,以一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他们还善于节约运用有限的资源,决不好大喜功,贪大求全,而是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办好若干重点专业和重点学科,以求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优势。当然,他们都是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科学家,深切理解并极为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譬如重视基础,循序渐进,学用结合等,因此,才能以较少的资源获致较大的效益,使学校发展蒸蒸日上。

这些校长本身就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学习榜样,他们的人格魅力、深厚学养、儒雅风貌,如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于无声。言教不如身教,乃是多数著名校长的准则。他们反对哗众取宠,恪守职业伦理,注重行为规范,这些都对学校优良传统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代大学校长在国际视野、知识更新与管理能力等方面可能有超越前辈之处,但是,在尊重教育内在规律,恪守伦理行为规范和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等方面,恐怕仍然需要向先驱者学习。对于当前社会风气的某些不良影响,并非所有高校主管人员都能高度自觉且富有成效地抵制,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一方净土。尽管现在我们大家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但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因此,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乃是最可怕的败坏,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甚至正如海外某些报纸所直言:意味着社会良心的迷失。我们并非过高期望大学的作用,而是希望大学应该自觉地承受更为重大的



社会建设的责任,不仅是物质文明,而且还有精神文明。如果本书系能增强读者在这方面的醒悟,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回顾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我对现今大学校长任期制的具体运作还有一点儿看法,即千万不可也不必机械执行。因为对一所大学的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真正有所认识,而制订学校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例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其利弊得失。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是很难实现一个校长的宏大抱负与施政方针的。实践表明,校长与领导班子的频繁更换或更换幅度较大,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有时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校长与教职员有一个相互认识过程,其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远远超过对于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的熟悉。平心而论,仅仅了解一所万人以上的大学的全面情况,没有三五年也很难形成校长自己的真知灼见。萧规曹随容易被等同于因循守旧,但其中确有合理的成分,即应该尊重前任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不必也不应轻率加以变更。譬如蔡元培有关兼容并包、择才而用乃至提倡美育等等精彩教育理念,从蒋梦麟到胡适等后任校长都能承续推行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在数十年内形成北大优秀的传统校风——北大精神。如果每逢来一位新校长,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宣称什么学校发展的新纪元,另提一套未经深思熟虑的新目标、新蓝图、新口号,势必造成师生员工思想混乱,很难形成新的共识与默契。高校颇感痛苦的是缺少相对持续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办学准



绳,不断地推倒重来,又不断地整顿纠偏,乃至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我期望有更多的人温故而知新,从本书系中汲取若干有益的办学规律。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决非提倡人治,更不是提倡家长制独裁。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成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高的民主观念,至少是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受 Orientation,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教职员的岗前培训要花费3天乃至1周,而且要花费很多时间“务虚”接受思想教育。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世变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守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我愿读者认真体味斯言。

我热爱高等教育,尊重前人的劳绩,更关心现今乃至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高等教育从一百多年前走来,它与现今高等教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近代以来大学校长们



用美好理想和教育实践酝积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治校经验,以及他们承先启后、发扬光大、舍我其谁的心志,必定对跨入新世纪的人们认识高等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刻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编撰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学术研究需要凝结朝气蓬勃的学术力量,发挥团队的智慧。为了保证本书系的学术水平,我们从全国多所大学广泛敦聘专家、学者,群策群力,共襄斯举。我们很高兴,本书系的撰著者,都是多年来活跃在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旧友新朋,为了共同目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不囿成说,勇于创新,各展学术个性,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两年来,孜孜兀兀,笔耕不辍,对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及办学特色作出了新的认识,新的考辨,新的评判,新的结论,这是很可宝贵的,也是本书系可以欣然贡献于学术界和读者朋友的。

本书系得以顺利完成,实赖于各位撰著者的精诚合作,谨表衷心的感谢;本书系终能如期付梓出版,还有赖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谨表诚挚的谢忱。此外,我们对本书系所有被征引的资料和图片的著作者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章开沅

2003年2月



早在世纪交替之际,为了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推动高教事业走上快速而正确的发展轨道,我们结合自己其时正在从事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这样的思考: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从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开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全国高校实行接管的半个世纪内,中国新型高教事业之所以能够在灾难深重的社会环境中取得相当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一类具特殊身份的新型学人,这就是近代中国高知阶层中的精英——大学校长们。他们对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产生、创办、变革和发展,以



自己平生的精力、智慧和才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进入新的世纪后,面临着“转型”和“入世”两大时代主题,我国高等教育如何发展,知识人才如何培养,在借鉴国际上他国经验的同时,早被历史证实适合自身国情的近代中国大学校长们办理高等教育的经验,更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总结。缘此,我们组织编撰出“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并在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下出版了第一辑。

之所以选择那些在办理和管理高教事业方面较有成就和较为成功的大学校长们作为研究课题,乃是出于下述几点考虑:其一,近代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是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的翘楚,加强对他们的研究和了解,无疑为人们认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外文化冲突交融过程中如何“转型”或“异变”,拓展出一条探究堂奥的路径,同时也使人们从一个侧面认识到近代中国的教育如何适应时局变化与世界教育接轨而完成自身的转型。其二,近代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有些人又是带有某种政治身份的专家学者(他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人”),加强对他们的研究和了解,必定能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近代一些爱国的高知人物如何在时代主题的感召下,借发展民族高教事业来救国救民的敬业精神和爱国精神,亦借此了解到近代中国高校书斋与政治舞台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或关系。其三,近代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更是中国高等学府的管理者或主持人,他们用平生业绩积累的历史经验,尤其在强调加快高校教育改革步伐、推进高教事业国际化和提高新世纪高知人才素质的今天,其



鉴益当今和指导现实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他们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校管理方式方法,对于今天的高校管理者们如何在新世纪内实现民主治校、科学管理等,自然弥足珍贵和颇有助益。

根据上述思想认识和研究思路,在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冬月间,我们于武汉东湖之畔举行了一场小型的“书系”编撰研讨会。大家经过讨论,进一步得出了如下共识:全体撰研者在充分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必须重点思考和解析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探讨那些在近代中国管理高校取得了成功经验的大学校长们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对大学教育如何定位,如何使高等教育在时代变迁中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和良性功能,充当社会进步的中心和良心。二是探讨大学的办理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独立性和连续性,为了求得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他们怎样使大学管理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在适应时代发展积极开拓进取的同时,又能使积极有效的管理措施和方法成为制度得到很好的坚持和贯彻。三是探讨大学校长这一特殊角色,如何在作好一位学者或科学家的同时,当好一个管理者,他们如何在办大学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是如何管理校园而不是在享受校园,更不是在利用校园作为个人升官的平台和谋利的资本。同时我们还认识到,对大学校长这一特殊群体展开研究,不仅要以全新的面目、全新的角度来展现被研究者的“大学校长”的风貌,而且要真正能让读者从字里行间“读”出这些大学校长为了民族的独立强盛而致力于中国高教事业发展进步的奉献精神。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注



意,既不是一般的人物传记,也不是一般的大学校史,而必须做到与被研究者进行“心灵沟通”,通过科学公允地阐释他的高校管理经验和理念,抽绎出对今后高校改革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的东西。

思路认识的一致,撰研目标的同一,使“书系”第一辑在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尤其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有鉴于此,我们坚持第一辑的撰研原则,即在研究的过程中力求史料翔实、去芜存菁、史论结合、客观公允,开始了本书系第二辑的编写和出版。其中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我们仍然认真地考虑到这组人物所在学校的代表性:暨南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为华侨学子开办的高等学府;北京师范大学则是一所完整意义上培养师资人材的高教机构。对四川大学等大学的校长进行研究,无疑为高教事业发展较为滞后的西部地区提供历史借鉴;而研究武汉大学校长则是对中部地区名校进行认真的历史总结。身为私立的厦门大学等高校,其创业艰辛筚路蓝缕,为今日民营高校导乎先路;罗家伦率中央大学千里西迁做到“鸡犬不留”,何炳松领暨南大学万般苦斗由是死里逃生,民族大难中濒临绝境的高教事业如何发展向世人树以楷模。胡适主政北京大学,既循蔡元培等人办学原则之“萧规”,但其办学理念与方法又非照葫芦画瓢地“曹随”;华岗长校山东大学,既是对旧式高等教育的改造,更是展现中国高教事业如何新生,当然后者留下的更多是引发后人们对共和国以来高等教育及其管理的反思……总之,这些学校有其诸多值得后世总结和借鉴之经验及法式,这些校长有其诸多值得今人学习和敬